

·版本研究·

国图所藏元刊残本《六书故》考论

张宪荣

内容摘要:国家图书馆藏元刊《六书故》虽然是一个残本,却是该书最早的版本。通过对历代相关资料的梳理和对清内阁档案及国图旧目的研究可知,元刊《六书故》在入明之后,最早为明文渊阁所藏,万历之后其部分残册为私人窃去,或转借传抄,此书方见录于诸私家目录。而未被窃取的部分则在入清之时一直深藏清内府,直到民国清理内阁大库之后,方入归北平图书馆(今国家图书馆)。惜其时诸馆目在著录上颇有出入,但知当时存有两个元残本。今除此本为国图收藏外,另一本则归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。此本虽残,却可窥见该书原貌,较后来毛氏影抄本更为真实;其版心之刻工名可补诸刻工表之不足;亦可正传世诸本之误,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。

关键词:《六书故》 元刊残本 流传情况 文献价值

《六书故》为宋末元初戴侗所撰的一部以六书理论阐释字义的小学著作。其“采古籀以正小篆之失”^①,以“父以联子,子以联孙”的原则探讨词义之引申关系,又以“因声以求义”的方式辨别文字之谐声、假借关系,于《说文》之外别开新路,对后世小学研究贡献颇大,故而孙诒让云:“平心而论,合溪之讲六书,虽瑕瑜互见,而其精识独造,实能通究原本”^②但由于他完全打破了《说文》体例,又以钟鼎文杂于小篆字头内,故一遭吾丘衍之“形古字今,杂乱无法”之讥(《学古编》),二遇四库馆臣之“非今非古,颇碍施行”之责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),三不为治《说文》者所重,即便征引之,亦多批评之语,如段注。故而其书,于元明清三代,版本绝少;而存世之版本,《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》一书所录最多,为10个。但观其所录,有现代影印者,有将《四库》本一分为四者,有原为一本而误录成两本者,实有失细考。归纳起来,其实该书仅著录了《六书故》的4个版本。而据笔者研究,该书还失收了存于国家图书馆之元

①(清)孙诒让撰,潘猛补校点《温州经籍志》卷七,中华书局,2011年,第310页。

②(清)孙诒让撰,潘猛补校点《温州经籍志》卷七,第307页。

刊残本、藏于温州图书馆之明汲古阁影抄元本及录于《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》之原陆心源守先阁所藏之写本三个本子。所以,加上这三个,《六书故》一书之存世版本实际上共7个。而这7个版本当中,元刊本是该书最早的版本。据《六书故叙》所云,此本由戴侗之孙戴奎委托赵凤仪于元延佑六年(1317)所刊的。也许是因为当时刊刻很少、流行不广的缘故,此本自刊刻之后便迅速消失于茫茫历史长河之中了,以至于明清诸家很少提及,而民国以来更难得一见,所以现代研究者大多以为此本已经绝迹于世了^①。而笔者幸于国图获见此本,故不揣浅陋,参考相关资料,先爬梳此本之流传情况,继介绍其被著录之情况,最后探讨其版本价值,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历代研究情况

从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看,历代对《六书故》之元刊本之研究可分为两种资料,一为历代目录书,一为序跋笔记,今综合叙之。

就历代目录书而言,最早著录《六书故》的应该是明代第一部官修目录《文渊阁书目》,是书乃当时馆阁大臣杨士奇于明英宗正统六年(1441)所编,共著录了四种:“一部二十册,完全;一部二十一册,残缺;一部二十一册,残缺;一部二十一册,阙”^②。稍后之明钱溥撰《秘阁书目》,仅题“二十(册)”^③。钱氏书目乃传抄《文渊阁书目》而成的^④,但在著录《六书故》上却仅著录了一种,大概是嫌其重复吧。但时隔一百多年之后,万历三十三年(1605)张萱、孙能传等奉敕编纂的《内阁藏书目录》,亦仅著录一种“二十册全”^⑤,原藏于文渊阁之残缺之本已不知去向了。

以上几种官修目录,反映的是当时文渊阁存藏《六书故》的实际情况,从渊源上看,其著录的版本应该一致的。但问题是,此书的版本在当时到底是哪个呢?可惜这些书目并未提及。笔者认为,应是上文提到的元刊本。

从明代宫廷藏书的来源看,《文渊阁书目》编纂之前的明代宫廷藏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元朝旧籍的。据《明史·艺文志》载:“明太祖定元都,大将军收

①按,今人有党怀兴先生著有《六书故研究》一书,对该元残本有涉及,但所言甚简;又,其有标点整理本《六书故》,观其校勘记,所引该书元残本仅11条。若将此书所引诸条与国图所藏残本相校,则颇有出入,故笔者推测其大概使用的是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所藏之残本,并非国图藏本,关于此,笔者另撰有《标点本〈六书故〉校勘记考辨》一文讨论(待刊)。

②(明)杨士奇编《文渊阁书目》,见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·明代卷》,中华书局,2006年。第1册,第123页。

③钱溥:《秘阁书目》,见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·明代卷》第1册,第252页。

④参见李丹:《明代私家书目研究》,南京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,第68页。

⑤张萱、孙能传等奉敕编纂《内阁藏书目录》,见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·明代卷》第1册,第364页。

图籍致之南京,复诏求四方遗书,设秘书监丞,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。永乐四年,帝御便殿阅书史,问文渊阁藏书。……北京既建,诏修撰陈循取文渊阁书一部至百部,各择其一,得百柜,运致北京……”^①而《万历野获编》又云:“太宗移都燕山,始命取南京所贮书,每本以一部入北,时永乐十九年也。初贮在左顺门北廊,至正统六年而移入文渊阁中。”^②杨士奇于《文渊阁书目》题识中亦云:这些书“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,未有完整书目。近奉圣旨,移贮于文渊阁东阁,臣等逐一打点清切,编置字号写完一本,总名曰《文渊阁书目》。”明太祖破元之后,便将元都之旧籍收归南京。永乐十九年(1421)时又将其中存书各择其一运往北京,贮存于左顺门北廊,但彼时并未有书目。直到正统六年(1441)移书于文渊阁东阁时,杨士奇才奉敕编目。由此可见,《文渊阁书目》所载之书即是元都所存旧籍。当时《六书故》一书尚有多部,万历间张萱编《内阁藏书目录》时,却仅存一本了。

那么,这些流失的版本都去哪里了呢?我们由以下两则记载可以略知一二:

1.(明)崔铤《六书故后记》:

正德己卯冬,予在京师见《六书故》于勋部马溪田伯循所,乃阁本也。约溪田共录之,溪田送予史一人,予自佣三人,封部马宗尧相一吏。录及半,予奔母丧将归,溪田知予好之,遂以其本赠,今返故牍书者是也,尚缺四卷已。溪田亦请告还关中,又两阅岁,予走书告于考功牛西唐道征。又半年书至,今界方楷书者也。挈正名物,辨析义理,核而当矣,未之前有。其曰:辩乎书名,则得立言之凡也;味乎辞助,则得命意之委也。故曰:未之前有也。文互楷篆,形错今古,失之亿且凿,斯其细也,勿以掩其大且精者焉。^③

2.今国图所藏《六书故》之清抄本,其后有赵琦美之跋云:

癸卯春仲假梁溪孙兰公抄本录七卷而有事于燕山之行,乙巳自燕山返吴而兰公已为异物。

丙辰仲秋于燕邸见会稽王云来(按,王应遴)案头借得阁本,因转借录之。惜也!阁本止十六卷矣,后并逸去。此书凡三十三卷,今得其半耳。

博罗张九岳(按,张萱)为樵政,于泮墅刻此书,曾以一帙遗予,予知为阁本录出而刻者,未必无误字。

既见元本,宁吝书佣值而不录之?且张刻板已归岭南,吴中所行不过百馀部耳,又乌得不录耶?

金陵焦弱侯(按,焦竑)先生有旧刻本全者,异日尚需录之。

①见《明史》卷九六《艺文一》,按,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亦有类似记载。

②见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一《访求遗书》。

③(明)崔铤《洵词》卷五,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,集部第1267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,第482页。

时万历四十五年(1617)丁巳孟冬初六日清常道人琦病疽中力疾勘毕书此数语。^①

第1条中,跋《六书故》者崔铤,生于明成化十四年(1478),卒于明嘉靖二十年(1541),他曾于“正德己卯冬”在京师马溪田寓所见到了阁本的《六书故》,不久之后,马氏“遂以其本赠”。可见,马氏从内阁借得此书之后,便已经据为己有了,否则不可能转而赠送于崔氏。“正德己卯”即明正德十四年(1519),上距《文渊阁书目》编成相差不足百年,便有了借书不还之事。而崔氏对赠书之事亦丝毫不以为奇,可见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遍的。

第2条中,跋者清常道人赵琦美,于“丙辰仲秋”(按,即万历四十四年,公元1616年)在燕邸王应遴住所见到阁本《六书故》。可见,此本亦为王氏据为己有了,否则怎么不精心看管,竟然“后并逸去”了呢?赵氏所见此书之时间,上据第(1)条中崔氏观书亦不足百年,而马、王二人窃内阁之书的时间肯定较之更早。据此,我们可以推知,至少从正德到万历这段时间,内阁中珍贵藏书肯定有不少是由马、王之辈带出去而逐渐散佚的^②。而且,值得注意的是,赵琦美、崔铤所见到的本子均为残本,而《文渊阁书目》所丢失的也恰好是残本,这似乎也进一步反证了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。

那么,这些从内阁借出来而据为己有的本子又是怎样流传的呢?我们认为,书既然已经是私家藏书了,那么就应该从私家书目中找答案了。

据现存的明代私家目录,最早对《六书故》著录的应该是祁承燾之《澹生堂藏书目》,该书卷二“字学”著录有“《六书故》三十三卷,十二册”^③,同时,赵琦美之《脉望馆书目》亦著录了“《六书故》,十二本”^④,最后为钱谦益《绉云楼书目》,著录了“《六书故》十二本”^⑤,而汲古阁亦有“元版《六书故》五十本六套三十两”的记载^⑥。

祁氏之藏书,据其《澹生堂藏书约》称,在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冬“小奴不戒于火,先世所遗及半生所购,无片楮存者”,之后他又尽力收求,及万历二十九年(1601)下第以后,“自入白门,力寻蠹好,询于博雅,觅之收藏,兼以所重易其所阙,稍有次第”,最终于万历四十一年(1613)“率儿辈手自插架”,编成书目,则《六书故》一书乃在其下第至编目十多年之间所获得。而这期间,其

①(元)戴侗撰《六书故》,清抄本,见《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·文字学门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5年,第41页。

②按,第2条中焦竑所藏之全本《六书故》,不知是否亦是从内阁中窃取之,或者本为自家私藏,均不可考,但是其《国史经籍志》所录之本,大概便是此本。见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五明代卷》第2册第733页。

③见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》五明代卷第2册。

④见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(明清卷)》商务印书馆,2005年,第9册,第108页。

⑤见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(明清卷)》第12册,第37页。

⑥(明)毛扆: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,见《书目类编》第32册,第5页。

仅在宁阳一代活动,而此地则坊间刻书颇多,“奇书异本,无从得而寓目也”^①,故而笔者颇怀疑祁氏所藏之本乃其所抄,并非刻本。而此本之后流传到了何家,颇难考见。不过其孙祁理孙之《奕庆藏书楼书目》,有“《六书故》三十三卷,乙套十四本”^②,不知是否即《澹生堂藏书目》所载之本?然即便二本相同,奕庆之书至后亦散佚不存了。

赵琦美所藏之《六书故》,据上引第(2)条,则为抄本无疑。不惟如此,观今国图所藏之有徐时栋识语之传抄本,前七卷字体颇大,后九卷则较为精工,但风格前后一致,当为一人之笔迹。此本虽为传抄,但依样誊录,应该可以反映赵氏原书面貌的。所以我们推定,赵氏原书应该也是如此,即前后笔迹因抄录时间不同而有不一致处,而这正好也印证了其所说的前七卷借自“梁溪孙兰公抄本”,后面则借自王应遴之阁本。赵氏之书,据张汉儒《张汉儒疏稿》云:“恶钱谦益见刑部郎中赵元度两世科甲,好积古书画,价值二万金。后乘身故,罄抢四十八橱古书归家。”^③原来赵氏之书很多都为钱氏所掠。而钱氏之书,据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卷二云:“然绛云一烬之后,凡清常手校秘抄书,都未为六丁取去,牧翁悉作蔡邕之赠……”^④赵氏之书特别是“手校秘抄书”后来均归钱曾,所以《绛云楼书目》和之后的《也是园藏书目》^⑤、《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》^⑥对此书的著录的卷数或册数均同《脉望馆书目》。而之后的《知圣道斋书目》也著录了“十六本”的《六书故》^⑦,不知是否即此本?但是无论怎样,赵氏之原抄本已经不知去向,仅留一传抄本存于国图。

汲古阁所藏之元刊本,可能最初归孙庆增所有,《上善堂宋元板精钞旧钞书目》有“毛斧季校本”即其证^⑧。庆增,字从添,一字石芝,江苏常熟人,清初著

①以上引文并见祁承燾《澹生堂藏书约》,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。

②(清)祁理孙编《奕庆藏书楼书目》卷十“小学之二字学”,见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(明清卷)》第14册,第87页。

③张汉撰《张汉儒疏稿》,见《虞阳说苑甲编》第五册,民国六年虞山丁氏初闲排印本,第13页。

④钱曾撰、丁瑜点校:《读书敏求记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4年,第57页,“杨銜之洛阳伽蓝记五卷”条。

⑤钱曾编《也是园藏书目》,见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(明清卷)》第16册第22页,“字书类下,著录了“六书故三十三卷”。

⑥钱曾编《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》,见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(明清卷)》第16册第234页;或《述古堂藏书目》,见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(明清卷)》第17册,著录了“六书故三十二卷,十二本”,卷数有异,不知是著录失误,还是钱氏藏了两本此书。

⑦彭元瑞编《知圣道斋书目》,见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(明清卷)》第23册,第82页。

⑧(清)孙从添编《上善堂宋元板精钞旧钞书目》,见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(明清卷)》第21册,第432页。

名藏书家^①，有《藏书纪要》等书流传于世。其藏书室名“上善堂”。歿后其书渐渐散佚，黄丕烈称自己亦“收藏不下数十种”^②，但其中应该没有《六书故》一书，因为传世的诸前辈所辑的黄氏题跋记并无之。又《静志居诗话》云：“其手录群书目八册，今存古林曹氏寺中，所储已尽流转于姚江御儿乡矣。”^③故而孙氏所藏之汲古阁元本《六书故》最后亦不知去向了，可幸的是，毛氏曾据之影抄了一本，今藏温州图书馆，卷首钤有“汲古阁主人印”“子晋印”“寿阳祁氏藏书印”“明善堂所见书画印记”等印，由此我们可知此影抄元本之源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明善堂乃怡亲王弘晓之藏书室，有《怡府书目》存世，但检此目，却并未著录此本，反而著录了“六书故，四套计三十二本，元板”^④，此元版书到底是不是来自汲古阁，我们不敢肯定。但是明末清初诸家之藏书，经过辗转递藏，最后多归怡府却是事实，所以我们不妨推测孙庆增之所藏《六书故》亦可能归了怡府，但其时应该已经有所残缺了，毛氏与怡府对此书统计的册函数颇有出入便是明证。

以上便是据现有资料所能推测出的从明文渊阁流出的元版《六书故》之流传状况（汲古阁本源头不明，暂且不计在内），尽管其间颇有断层，但大致不出此范围。另外，在清代的私家目录里，还有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三所著录的“三十三卷，延佑六年赵凤仪序”，《棟亭书目》所著录的“三十二卷，二十册”，及《传是楼书目》著录的“十二卷”，但著录版本不详，且与明代诸家书目著录颇有出入，故源头亦不明确^⑤。总而论之，元刊《六书故》在明清两代私人藏家中确实是所藏了了，最初之本多从内府流出而众人传抄，故无论刻本还是抄本多著录为残本。迨及民国以来，则更难得一见了。今检民国以来诸家藏书目，明张萱刻本亦很少著录了，更何况此元刻本呢？所以，我们不得不再次将目光转向内府藏书了。

二、国图各书目著录情况

前面我们说过，一些残缺的元刊《六书故》在明代多为官员窃出而据为己有了。那么，《文渊阁书目》等馆目所著录的其他或全或残的本子最后又去了哪里呢？我们认为，它应该在明清易代时归于清内府所有了。但是，乾隆皇帝下

①据谢灼华考证，其生于康熙初，卒于乾隆初，见谢灼华：《孙庆增其人及其书》，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，1986年第4期。

②见《藏书纪要》识语，收入《士礼居丛书》。

③叶昌炽撰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十引《静志居诗话》语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38页。

④《怡府书目》，见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（明清卷）》第22册，第222页。

⑤按，丁氏《八千卷楼书目》著录有“三十三卷，元刊残本”的《六书故》，见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（明清卷）》第6册第521页，但检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五，有明刊本，续四库本第221页并云：“此书卷帙多缺，海盐徐次云以为元刻见赠，虽亦不全，仍存良友之谊尔。”由此可见，《八千卷楼书目》所著录之本即此明本，乃误录。

旨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并未将之取出,却采用了明刊之“两江总督采进本”^①,所以这些元刊本一直深藏内府,直到民国时入藏国家图书馆。我们有以下证据可以证明:

首先,由民国二十二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的《内阁书档旧目》及藏于北大的《补目》有如下几条记载^②:

(1)“第四柜,《六书故》八本,不全”(目六第241页)

(2)达成阿、科占、卢文昭及供事十四名于八月二十二日查:“《□□故》,八本”(目十第294页)又,《补目二·书籍簿册》云:“八月二十二日查(东第二间朝西厨内):《六书故》,八本。”(目十第431页)

(3)赫达滋、□格、□泰、陈捷、马达纳及供事十五名于八月二十五日查:“《六书故》,陆本”(目十第302页)又,《补目二·书籍簿册》记载:由侍读学士佟士德率领马达纳、傅昆及供事十五人于“八月二十五日查:《六书故》,六本。”(补目第440页)

(4)洪字柜下层,“《六书故》,十四本”(目十一第334页)

第(1)条来自《目六》,据考证,“……这些书在乾隆初年尚被称为文渊阁之物(那时清代度藏《四库全书》的文渊阁尚未产生),而此目也就可以谓清初所编的文渊阁书目了。”^③

第(2)(3)条来自《目十》,据考证“此目是是年夏季以后乾隆十年十二月以前编定,而目中所记的八月、九月竟是这一年的八月、九月了。”^④

第(4)条来自《目十一》,据考证,“此目为乾隆二十九年《会典》写本书成贮库后,是年十一月领出副部以前所编的。”^⑤

由以上档案和学者考订,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,第一,清乾隆开四库馆之前,清宫内府所存古籍多是明朝文渊阁所藏,但是当时并未得到足够重视,所以即便是乾隆皇帝敕修《四库全书》时亦未得到有效的利用,故而像元版《六书故》这样在当时足够珍贵的古籍能够幸免被删改的厄运。同时,在《四库全书》修完以后,深藏在内阁的这类书亦未得到彻底清理,所以,素以版本鉴赏见长而闻名于世的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及其《后编》均未著录这些元刊的《六书故》。但由于整个清朝自始至终并没有将这些书进行合理的保存,所以后来亦损坏不少。第二,从上面的档案可以看到,存于清内府的元版《六书故》一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见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,第226册,第116页。按,此本与李鼎元重刊本一样,底本均为明张萱刻本,卷六“泣”字下有“萱曰”一词可证。

②按,两份资料均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辑《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》第七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8年。

③见方苏《叙录》第193页。

④见方苏《叙录》第197页,《补目》考证同。

⑤见方苏《叙录》第334页。

书,大概有三个本子:一个八本,一个六本,一个十四本。其中,著录最后一个本子的档目据方苏考证是乾隆二十九年(1764)修《会典》时编的,也就是说那里的书曾经被拿出来使用过的。而《六书故》一书自刊刻传世以来就没有这么多册数,所以这个“十四本”大概是不存在的,而是前两个本子的册数相加而得出的数目。这个推测,我们觉得应该是说的过去的。

其次,据民国七年京师图书馆所编的《清内阁旧藏书目》记载,有“《六书故》三十四卷,宋戴侗撰,明刻本,存卷一至卷四,十四,二十一,二十四,卷二十七、八,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,存八本。”^①

按,此条著录疑有误。首先,按照《六书故》一书的流传状况,此书本有三十三卷,而此处著录为“三十四卷”,当误。其次,此处著录版本为“明刻本”,盖亦有误。据其《序》称:“清内阁书即明代文渊阁藏书,杨士奇等所编置也。阁中大库有‘内阁典籍’掌管,清初曹贞吉为典籍时,宋槧已散失殆尽。曹氏检阅宋本,见欧阳公《居士集》八部,无一完者。嗣后,典籍一官多以满员充之,更不珍惜,甚至失火,几付一炬。今馆中所藏内阁之书,均前清季年由学部发来。除残缺外,有水温者,有烟焦者,有霉烂者,大约失火时之受损耳,至《清内阁书目》,馆中人均未尝见也。兹由赵次原先生由部中携来,悉照原订六册,计分四种……”^②,可见,此目主要是著录在清宫内阁所存的书目,而我们从上面所引的档案中也可以发现,《六书故》一书均为元残本,并无明本。而且,此本共八本,与上面所引《目六》《目十》所录亦同。所以我们敢肯定此目所录的《六书故》一书一定是前引档案所著录的元刊本,而非明刻本。而且,从这个序中,我们也证明了,清内阁的书便是来源于明代文渊阁。而《目六七》之方苏《叙录》亦云:“清内阁藏书中,除掉清代官修、官刻及因纂修校刊而征集的书籍外,差不多是明文渊阁所遗之物。”

总而言之,原存于明文渊阁中的元版《六书故》一书,自始至终保存在清内阁大库内,直到清灭亡之后,才转移到原北平图书馆中,但是清理时,由于没有得到合理的鉴定,故而著录有所失误。而且,从现有的资料看,北平图书馆在民国前后所编著的三个目录书中,虽然对此书的版本都确定为元刊,但在具体著录上却又颇有出入。

最早为国图编目的是缪荃孙,其在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中,收录有《六书故》三十三卷,云“元戴侗撰,孙逢校刊。四明袁大壮作赋,元刊本。每半叶七行,行十六字,高七寸六分,广五寸,白口,单边,上层标本字,上字数,下有刻工名,蝶装。有‘都省书画之印’,未有‘礼部评检书画关防’。存一之三、六、十四之十八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之二十八、三十一之三十三。”^①

^①京师图书馆所编《清内阁旧藏书目》,见《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》第七册,第726页。

^②京师图书馆所编《清内阁旧藏书目》,第529页。

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编成于宣统三年(1911),《艺风老人年谱》“宣统三年辛亥,年六十八岁”条云:“欣逢同志,允于今冬将书目交卷,乞假回宁,专办志事,以冀成功。革命倏逢,遂成画饼,惜哉……六月,编呈各省志书目四卷……九月复交新编善本书目八卷,即乞假回上海寄寓。”^②此目比上引民国七年(1918)所编的《清内阁旧藏书目》还早七年,但相校二目所录卷数,颇为不一致。前目著录共十二卷八本,繆目则著录了共二十卷。

继而为民国五年所编的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书目》,其对《六书故》一书著录为“三十三卷,存卷1-2、6、14-18、20、22-28、30-33,十三册又重一册,元刊本,清内阁书,卷内有‘都省书画之印’,末有‘礼部评检书画关防’”^③。与繆氏书目相比,残存卷数同,但具体的卷数却有出入,可知,此目著录亦有问题。

颇为学者推崇的应该是民国二十二年(1933)由赵万里先生所编的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。经其重新对馆藏古籍核查,于该目“字书之属”内,对元版《六书故》一书共著录了两本^④:

(1)存十二卷,1-3、6、16、21、24、27-28、31-33;

(2)存十卷,6、14-15、17-18、20、22-23、25-26;

册数虽然没著录,但是在具体卷数上却一清二楚,故而我们认为它是可信的。与上引诸多目录书相校,该目亦出入很多,但大致可以确定,上述三目所录的《六书故》,大致同于此目的第一本,可能即那个八册本。而在卷数上那些不同之处,可能是著录上统计有误,也可能是之后又有所散佚,亦未可知。而此目中的第二个本子,前三目虽未著录,但是实际上是存在的。据相关资料显示,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当时曾经对北平图书馆的一些古籍进行过影照,其中的一本书便是此《六书故》,王重民先生在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记载^⑤:

六书故

残 存十卷 六册(《四库总目》卷四十一)(北图)

元刻本[七行十七字 1.4+21.4×14.8]

①繆荃孙编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见《古书汇刊》第1集第7册。

②繆荃孙编:《艺风老人年谱》,见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9年,第180册,第735-736页。

③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书目》,见《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》第十二册,第17页。

④赵万里编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四卷补遗一卷,民国二十二年(1933)朱印本,见《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》第十五册,第37页。又,昌彼得著《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目》,见《版本目录学论丛》,(台北)学海出版社,1977年,第236页。

⑤王重民: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,第56页。又,据杨殿珣序云:“在鉴定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善本书时……摄制北京图书馆在抗战时度存于美国之善本书籍。有三每摄照一书,亦写提要一篇”,据此,《六书故》一书的提要可能就在此时写成的,见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第3页“杨序”。

元戴侗撰。凡存卷六、十四至十五、十七至十八、二十至二十三、二十五至二十六。卷内有“都省书画之印”，末有“礼部评检书画关防”，关防上有墨书“温字十六号”。

与赵万里先生所录的第二个版本相比，具体卷数相同（王先生著录为存十卷，但是在具体卷数上却实际是十一卷，可知应该是笔误，实际上同赵万里先生之著录），而且还明确说共六册，与我们之前所说的“六本”本同。按，三十年代，北平图书馆的部分珍品曾运往美国国会躲避战火，后均归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所有，今检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，果然有录：“六书故存十卷六册，元戴侗撰，存卷六、十四、十五、十七、十八、二十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五、二十六，北平”^①。此处明确注明是“北平”，可见确实是赵万里先生所录的那个本子，也进一步证明王重民先生所录之误^②。

由此可知，至少在三十年代前后，从明文渊阁经清宫内府流传下来最后归入原北平图书馆的元残本《六书故》一直存有两个本子，虽然在具体卷数上可能有所损伤，但大致能反映该书原貌。所以，该书自始至终并未亡佚。

三、现存元刊本《六书故》价值

该本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。我们认为，其至少有以下几方面价值：

首先，上面论述亦提及，由于元版《六书故》长期待字闺中而不为人所知，以致于后人多认为其已经亡佚于世了。幸好温州图书馆存有明汲古阁影抄元本（以下简称“汲古阁影抄本”），并且于2006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出版了，所以稍稍可慰学界之心。而且，汲古阁影抄本素以描摹逼真，装帧精良而自古被认为“下宋元一等”之本，故而深得诸多藏书家重视。今将此本与元残本《六书故》相比，可以发现，无论从版式，还是字体，二者的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，甚至每叶版心之大小字数及刻工名亦依样描写，让人不得不佩服汲古阁影抄之精。但是，在具体的所附资料上，却又有所不同。汲古阁影抄本首有延佑庚申冬赵凤仪序，继而为戴侗所撰《六书故叙》，以下依次为（延佑）庚申年王志《延佑丁巳弄》，四明袁大壮《六书故赋》及《六书故目》《六书通释》等。但是检元残本，首仅有《六书故目》和《六书通释》，末才附《六书故赋》，而且前引缪氏之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，亦仅仅著录有袁大壮之《六书故赋》。故而可以肯定，汲古阁影抄本在装订时有改变原书顺序的情况，而且，至少庚申年王志《延佑丁巳弄》等亦是毛氏新加的。所以，从所附资料来看，元残

①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特藏组编：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，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，民国七十五年（1986）增订二版，第77页。

②按理来说，此本既然为元本，虽有残缺，但亦是难得的善本，但是奇怪的是，十年之后即民国八十五年（1996），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所编的《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》内并未著录此书，难道有所遗漏，还是已经丢失了？

本可以重现旧本之原貌,且显现汲古阁影抄本之对原书之改动状况。

第二,从版本学上看,从刻工考订版本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之一,故而历来受到版本学家的重视。元版《六书故》亦有不少刻工名,可以补诸家刻工表之不足。今将此本刻工依出现顺序列之于下:

张云谷(云谷、张、云、谷),王,玉(一玉),德明,俊,邵(卩),明(日),伯大(大、伯),徐,洪泽,周,丁,宋(宀),裕,主,商,真,合,口,佐、左

这些刻工,有完整姓氏者不多,多得是仅题一姓或一名,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,我们不敢妄自将这些单独的或姓或名进行连接,故而如实列出,以待方家考证。

最后,作为后世诸本之祖本,其校勘价值自不待言。今将明本、李鼎元重刊明本(以下简称“李本”)及明汲古阁影抄元本与之相互对校,可以发现有很多足供参考之处。今择取数条,分列于下(按,页码为李鼎元本之页码):

(一)与诸本均异处举例:

(1)卷二第10叶,“暴”字,元残本作“暴”,明影抄元本作“𩇑”,明本作“𩇑”,李本作“𩇑”,很明显,元残本与诸本字形有异。

(2)卷二第17叶,“梦”字下,“𣎵”字,元残本作“𣎵”,明影抄元本作“𣎵”,明本作“𣎵”,李本作“𣎵”,此字符残本与后三本均异,明本与李本同,而又与明影抄元本异。按,该字在《六书故》中亦作字头,明本与李本并作“𣎵”而明影抄元本作“𣎵”,三本大致相似。

(3)卷二第19叶,“𣎵”字下小注,“从心从舟”之“舟”,元残本作“舟”,明影抄元本作“舟”,明本与李本并作“舟”,可见,前两本均摹刻有误。

(4)卷三第15叶,“𩇑”字下小注,“郭璞曰今之三隅灶也”之“隅”字,元残本作“隅”,明影抄元本作“隅”,明本作“隅”,李本作“隅”,很明显,元残本在最后一笔上与诸本均有异。

(二)与明影抄元本近同而与明本、李本异处举例

(1)卷二第11叶,“景”字下,“又曰景行行止”之“止”,元残本作“止”,明影抄元本作“止”,明本作“止”,李本作“止”,此字符残本与明影抄元本近似,而明本及李本则是经过了修正,将最后一笔拉直了。

(2)卷二第25叶,“霰”字篆字头,元残本作“霰”,明影抄元本作“霰”,明本作“霰”,李本作“霰”,该字左下角之“𣎵”,元残本略有湮漫之处,但与明影抄元本最近,而异于明本及李本。

(3)卷三第16叶,“燭”字篆字头,元残本作“燭”,明影抄元本作“燭”

熿
子
肖

熿
子
肖

熿
子
肖

“肖”，明本作“肖”，李本作“肖”，元残本与明影抄元本同，而与明本及李本异。

(三)与明刊本、李本近同而与明影抄元本异处举例

(1) 卷二第17叶，“夜”字篆字头，元残本作“𠂔”，明影抄元本作“𠂔”，明本作“𠂔”，李本作“𠂔”，此字符残本同明本与李本，而与明影抄元本略异。

(2) 卷三第13叶，“烝”字下，“南有嘉鱼”之“鱼”，元残本作“𩺰”，明影抄元本作“𩺰”，明本作“𩺰”，李本作“𩺰”，此字之下半部分，元残本与明本及李本同，而明影抄元本则摹写有误。

(3) 同上，“炷”字下小注，“炷”之“炷”，元残本作“𩺰”，明影抄元本作“𩺰”，明本作“𩺰”，李本作“𩺰”，此字符残本与明本、李本同，而与明影抄元本有异。

从上举各例可见，元残本与诸本有均异者，有近同于明影抄元本者，有近同于明本及李本者，不一而足。而亦有元残本描摹失误处，如第(3)条。但是从整体上看，明影抄元本虽然有与该元残本有一些异处，但大多情况下还是与之相同的。可能毛氏影抄时亦有所校勘，今检该本第二十八卷末有行书两行，云：“四明范□兰寅生甫校改二字，一司字，一上字”，可证其确实有所修改。而明本因为是重刻，且明确有校改痕迹，故而在字形上时有与元残本有异处。李本乃据明本影刻，故而误处亦多同。所以，如果从保存原貌的角度看，明影抄元本是最接近元刊本的。今元刊仅存一残本，至为可贵，足可正诸本之误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其亦并未完美之本，失误之处在所难免。前引赵清常之跋云：“(张萱)曾以一帙遗予，予知为阁本录出而刻者，未必无误字。”揣摩其语，似乎在赵氏眼中，元刊本亦不是一个完美的本子。

【作者简介】张宪荣，男，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。研究方向：古典文献学、语言文字学。